

「今天与昨天」

——中国社会历史问题散论

魏光奇 著

“民本”和“资本”：中国古代理政治学
历史视角与经济学困境
西风东渐：挑战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类型”
实用主义与物质主义：人文精神的对手
难忘岁月：在历史的日子里

河南人民出版社

今天与昨天

——中国社会历史问题散论

魏光奇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天与昨天:中国社会历史问题散论 / 魏光奇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1
ISBN 978-7-215-07853-6

I. ①今… II. ①魏…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
—中国—古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0946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5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5

字数 35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自序

自1980年代中以来,我曾陆陆续续写过一些读书感想或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文章,如今遇到机缘,结成了这样一个集子,姑名之为《今天与昨天——中国社会历史问题散论》。

我出生于北京,16岁时赶上“文革”,后来到晋东南农村插队4年,在长治一个小工厂做工6年。至28岁时,我考取了山西大学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到高校教书,算是有了自己的专业。不过,年青时的经历和当时社会的动荡,使我养成了看“杂书”和关注现实的习惯,有时也写一点儿心得、感想拿出来发表,就是如今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这些东西。这些“杂文”,虽然前后撰写于20多年的时段之中,但我自己体会,其中还是蕴含有某种一贯的思想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十分活跃,诸如威权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都能得到一些人的认同。我感觉,对于这些“主义”的中国版,大概直至今天人们也还不能准确地搞清其内涵和彼此界限,起码我自己还搞不清。所以,我的文化立场就是暂且不去认同任何一个。有时,我倒是愿意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反思自己和别人的思想倾向。

先秦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源头。诸子之中,儒、墨、道、法四家对社会政治有兴趣。但老、庄的社会政治思想蕴藏于其哲学表述之中,且比较支离(汉代的黄老学与其说是道家,不如说是法家);墨学长期湮没,对后世影响较小。唯有儒、法两家,其社会政治思想充实,且能与时俱进,对后人影响很

大。儒家与法家的社会政治主张有很多，而透过这些具体的主张，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两派各有一种基本的取向。大致说来，法家务实，其基本取向在于富国强兵，至于社会是否美好、理想，则非其所计。儒家陈义较高，其基本取向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礼记·礼运》中关于“大道之行”的那段著名文字，就反映了儒家的社会理想。相对于富强来说，儒家更重视社会的公平、公正、幸福，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政治方面有“民主”倾向，主张“民贵君轻”，“选贤与能”；主张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提倡利他、为公、和谐的社会道德风尚，“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如果用这副“眼镜”来看待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革命家，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思想特征（而不是内容）或属于儒家一脉，或属于法家一脉。例如，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李鸿章、袁世凯大概都可以归为“法家”一脉，而康有为、孙中山，则可以归为“儒家”一脉。

用上述这种“二分法”体察自己的思想倾向，我自认为自己属于“儒家”一脉。从年青时开始直到现在，我写这些“杂文”来表达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的关注，所采取的立场一般来说总是具有“儒家”式的理想主义特点。我1950年出生，比人民共和国小一岁，可以说与人民共和国同步生长。人民共和国在它的不同成长阶段，都取得了伟大成绩，但也有过失误，执政党曾对此作出过认真总结。以我“儒家”式的观察，人民共和国的失误前30年在一个“斗”字，后30年则在一个“利”字。主张“斗”而反对“和”，重视“利”而轻视“义”，都不符合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在我写这些“杂文”的二三十年中，以“斗”为纲的错误已经基本得到矫正，而以“利”为纲的倾向则时有表现。这些表现包括：主张“效率优先于公正”，片面追求GDP增长而忽视财富的公平分配，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政治建设，误将腐朽的物质主义当做现代意识，等等。现在人们关注的官场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以及各种民生问题，都是在这种“重利轻义”倾向的背景下出现的。近年，执政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些都是很好的口号，都能切中“重利轻义”的“时弊”，尽管落实这些口号还须克服许多阻力。

我自己深深知道,理想主义的各种社会政治主张,从来都是难以付诸实行的,起码是难以完全付诸实行的。然而,这类主张的价值并不在于它能原原本本地得到实行,而在于它能为人们提供发现社会弊病的参照系。“金无足赤”,“白璧微瑕”,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绝对“美”、纯粹“善”的事和人,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于“美”与“善”的追求。孟子说“士无恒产而有恒心”,就是说士有稳定的、执着的精神追求,并坚持通过各种途径表达,“明其道不计其功”,“知其不可而为之”。这里的逻辑是,恰恰由于理想主义的主张难以实现,才更加需要理想主义者坚持不懈地表达。《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2011年2月15日

目 录

政 治 篇

官民对立:他看透了秦汉之制

——读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3

秦汉之制与公社古丹 8

兴利与防弊:“小政府”理念在中国 15

我看自由主义 20

“民本”和“官本”:中国古代的政治学 26

代议政治与多元社会

——读章太炎的《代议然否论》 32

审势·宽严·反其道 37

解读黄仁宇 39

哀哉“驯服工具” 43

由山西朔州“假酒案”想到的 46

官治与自治:中国近代的县乡行政体制 48

借鉴与启示:县制问题的历史思考 53

“二实二虚一自治”: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之我见	62
回顾与思考:我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分层.....	73
威权与民主:两种政治社会体制的选择.....	78
现实难题的历史透视	
——社会控制机制的危机与出路	85
历史文化传统与改革模式的选择	92

经济社会篇

“鸭子”不必“上架”	103
“生财”不可“无道”	105
“减税”还是“减费”	108
财政增收:先看病后吃肉	111
话说节俭观念.....	113
高校增收学费须三思而后行.....	115
“效益薪金”解析	
——从《红楼梦》说到《资本论》	119
做“良商”的难处	123
遵守规则:谋略的前提	125
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宝钢企业管理	128
家产制管理——国有企业放权的陷阱.....	132
企业应该“三权分立”	136
历史视角缺位与经济学的困境.....	138
重提《哥达纲领批判》	143
儒家如是说:“公平重于效率”	146

再造“大同”信念

- 建设符合国情的经济伦理····· 150

历史篇

- 苏逢吉“静狱”····· 163
- 杭世骏——卖破烂的学者····· 165
- 晚年曾国藩····· 168
- 曾国荃山西救赈····· 172
- 晚清的“鬼使”····· 174
- 宦官·宫女·胭脂沟····· 176
- “皇灾”烈于蝗灾····· 177
- 科举考试中的“复习材料”····· 179
- 贾政难做清官····· 181
- 大观园里的“承包制”····· 183
- 清末莱阳民变散记····· 185
- 为清末革命党人说几句话····· 189
- 辛亥革命：在改革中爆发····· 191
- 插队前后读书生活漫忆····· 196
- 难忘岁月：在后泉的日子里····· 206
- 以史为鉴：农村社区建设溯源····· 215
- 谈谈清代的科举制度····· 221
- 自利集团：透视清代的州县官府····· 240
- 西风东渐：挑战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类型”····· 248

思想文化篇

佛教的真谛:与万事万物相通同	259
文化选择:历史观察的另一视角	264
重提“兼容并包主义”	268
三个层面:也谈“为学术而学术”	271
经世——社会人文学科的灵魂	274
高校文科教学中的误区	277
旧书新谈四则	281
《中国抗战局势与国际政治关系》序	284
尼采的启示:中国人应如何追求自由	289
玩味老子:弱者的智慧	293
兵法要诀:突破薄弱	296
关于“礼”的思考	
——纪念刘宗绪先生	299
实用主义与物质主义:人文精神的敌手	302
大学精神:自由思想与人文关怀	308
“二患交伐”:中西文化精神的劣化结合	
——读鲁迅的《文化偏至论》	311
人还是应该“有所畏惧”	
——谈孔子的“畏”和“惧”	315
中国伦理的现代化:王学嫁接西学	317
建设开放、立体的伦理体系	
——新时期中国伦理建设问题之我见	325

历史文化传统与改革的精神机制·····	333
《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导言·····	343
《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结语·····	351
致 谢·····	364

政治篇

官民对立：他看透了秦汉之制

——读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自西周实行井田制、分封制，中经春秋战国的大动荡，至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完成了一大变迁。此后历代虽然全都有所损益，但作为这种制度灵魂和主干的君主官僚专制，却始终没有变化。所以清末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一位历来主张“古为今用”的伟人还强调“百代都行秦政制”，并发动全国人民起来尊法批儒。显然，他承认，“秦政制”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这种始建于秦而进一步完善于汉的“政制”，被有的学人称为“秦汉之制”，认为它构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来，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秦汉之制是以君主和官僚专制为其特色的，正是这种君主和官僚专制，使得它一方面同我国西周而另一方面同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政治制度区别开来。然而，在苏联历史理论的影响下，我们的教科书对于秦汉之制下的社会分层，却大谈什么“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而对于君主与官僚，却仅仅将之视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没有看到他们才是中国这段历史中的真正剥削阶层、压迫阶层和统治阶层。

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几个“说不通”。

首先是于理不通。马克思曾正确地指出，封建社会是一种政治性的等级社会，不存在近代那种单纯经济范畴的私有财产和阶级。在这种社会中，宫廷官职、审判权、“各个省”、“掌管国家大事的权利”，直至“主权——这里指民族”，都是特权阶级或皇帝的私有财产。割裂政治和经济来看封建社会，什么也解释不通。

其次是于史不通。直至 19 世纪末西风东渐之前，中国人自己从来没有过

作为地租剥削者意义上的“地主”概念。“地主”一词,在古代汉语中只有两义:一是相对于过客而言的当地主人,即日常所谓“尽地主之谊”者是也;二是一种神祇,即老百姓所说的“土地爷”。而今天各种教科书上作为地租剥削者频繁出现的“地主”,纯粹是将西文中的 landlord 硬塞进了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而当时人观察自己时代的社会分层,从未将“地主”与“农民”作为基本范畴,而是区分“官”与“民”(“民”又分为士、农、工、商,所谓“四民”)。

再次是于俗不通。谈秦汉以后的社会对抗,中国已经形成了妇孺皆知的成语,俗者如“官逼民反”,如“逼上梁山”,稍雅一点的如“苦于君官,铤而走险”等。为什么不谈“地主逼民反”呢?为什么不谈“苦于地主”呢?翻一翻《水浒传》,晁盖、宋江、林冲、鲁智深、李逵、阮小二兄弟等好汉,到底是被“地主”还是被“君官”逼上梁山的呢?这些似乎用不着学术分析和考证,事情就一目了然地摆在那里。

显然,用“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解释不了中国秦汉之制下的基本社会分野,然而人们却一直人云亦云地唠叨这种说法。而今天,当我们试图重新审视这个事关正确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问题时,却惊喜地发现,早在 50 年前,一部理论著作已经对它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部著作便是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这部著作指出,秦汉之制下的中国政治,是一种官僚政治。这种官僚政治,不是像近代社会那样,仅仅作为一个政治操作的“技术方面”存在,而是一种“社会体制”。其基本特点是,“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在这种社会中,官僚阶层或士大夫阶层不是简单地“代表”其他阶级,而是“自有特殊利益”,“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也就是说,“官民对立”是这种社会的基本阶级分野,当然所谓民,首先就是农民(见《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 20、60~6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王亚南先生真正看透了秦汉之制下的社会分层问题。

说官僚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是因为它像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一样,有着自己不同于其他阶级的独特生存方式。官僚阶级的独特生存方式在于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即所谓“以权谋私”。“做

官”与“发财”不可分地连在一起，“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混财”。

官僚阶级的“以权谋私”，首先是直接性的贪污和受贿。王亚南先生指出，中国的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而且这种贪污并不是一种“仿佛有一二出类拔萃的人物出来表率一下……就会改变过来”的“风气”，而是一种制度。由于低俸不足以养廉（具体办事的吏役甚至全无工薪和公费），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君主官僚的一元化统治下不可能存在来自体制外的异体制约，遂导致贪污受贿成为一种普遍化、日常化的现象。利之所在，官吏趋之若鹜，虽严刑峻法不能禁止。

更为重要的是，官僚阶级“以权谋私”，离不开与地权、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结合。作为《资本论》最早中文全译本译者之一的王亚南先生，不像一些教条主义者那样，将商业、商人和商业资本统统看做是封建制度的对立面，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之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指出，在秦汉之制下，商业的繁荣并非新生产方式产生的表现，而是官僚阶级残酷剥夺农民的结果。“官僚愈是以超经济榨取的方式，使农业生产者占有的必要劳动生产物部分愈少，商业流通循环的规模就愈大。”西汉等少数王朝在一定时期内实行的抑商政策其实并没有实效，他重视司马迁的话——“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

于是，在秦汉之制下，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就往往“四位一体”，“商业、高利贷、地权兼并、差役、摊派、贪污，都像配合得非常周密”。王亚南先生强调说：“我认定‘官逼民反’的‘官’，不当理解为某个或某些特别的官吏，而是整个官僚统治。单是某些官，甚至单是整个官僚阶层依贪污或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农民尚不致逼到求生不得的程度。若官僚除了自己直接借政治权势侵渔农民外，更连同与其有缘属关系的地方爪牙，从事敲诈，再益以商业、高利贷业乃至地权活动的凌夺，那才真是农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时候了。”

王亚南先生的以上论述告诉我们，在作为“社会体制”的官僚制度下，商业繁荣不仅不能促进社会向新的高级形态过渡，反而最终要导致人民“老者转乎沟壑，壮者散乎四方”，不得不起来反抗，“或零散变为盗匪，或集体起来

叛变”，生灵涂炭，天下大乱。这些话，至今发人深省。

王亚南先生十分重视唐中叶开始实行的“两税制”，认为它是此后历代官僚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也显示出他对中国历史与政治的深刻见解。

在唐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下，国家办社会，官僚机构具有组织社会经济的职能。然而一方面官僚政治自身具有腐化倾向，另一方面它的僵化难以适应流通经济的发展，致使其“法”日益“弊”，到了唐中叶，终于失去了保证国家税收的功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晏的改革和“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它们靠利用流通经济和承认贫富分化来保证国家税收，也使得生产力暂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这种改革只是弱化了国家组织社会经济的职能，而没有弱化官僚政治作为“社会体制”的压迫性和寄生性。相反，它依靠商业机制和贫富分化来为皇权和官僚阶级谋取利益的特点，反而使得这种压迫性和寄生性急剧膨胀。因此，稍把眼光放远一点就可以看到，这种对官僚政治不作触及，而只是削弱国家的经济职能转而去利用商业机制的改革，其实只是顺应了一个王朝走向衰落和灭亡的趋势，而谈不上什么历史进步。此后唐王朝走向崩溃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搞改革，不论什么时候，这个教训全都值得记取。

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孙越生先生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所作的序言。

孙越生先生是王亚南的学生，王先生撰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得到孙先生的大力帮助。对此，王先生在该书初版的《自序》中曾专门提及，并表示感谢。王先生大著的出版，正值1948年蒋介石政权崩溃的前夕，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在望。他预言，随着工农政权的建立，中国的官僚政治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再次证明历史前进的道路不会是笔直的。“文革”爆发，王先生在遭受数年残酷折磨与迫害后，于1969年含冤去世。孙先生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官僚政治弊端淋漓尽致、登峰造极的大暴露，因而有条件将先师对官僚政治的剖析与批判进一步引向深入，他精湛的学识也使得他能胜任于此。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所作的这篇《序言》就是孙先生在这方面的一篇力作。

这篇序言作于1980年，当时人们正在对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罪行进